

◎ 主 编 宋原放
◎ 副主编 吴道弘 王建辉 张立升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中国出版

史料

古代部分

第一卷

宋原放
王有朋 辑注

湖北教育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中国出版

史话

古代史话

中国出版集团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中国出版集团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中国出版史料

主 编 宋原放

副主编 吴道弘 王建辉 张立升

古代部分

第一卷

宋原放
王有朋
辑注

湖北教育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编辑说明

一、《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所选收的史料论及春秋（公元前 770 年）简帛时期到 20 世纪初（1910 年），这么一个历史阶段的出版活动。其中 1840 年以后的近代部分因另有《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的出版，古代部分仅选收少量史料。

二、本书所收史料包括历史文献，以及有较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资料，旨在较完整地反映中国古代图书编纂、出版、印刷、发行的概貌。所收文献的立场观点不代表编者的臧否。

三、古代部分分一、二两卷，共收史料、文章 62 篇。卷首有图片 61 幅。这些图片主要由中国印刷博物馆罗树宝先生提供。

四、本书采用文后注，交代所收史料的题解、作者、出处、引文、说明等情况。凡原注者注文，均在注码后加“[原注]”字样，未加“原注”字样者为本书辑注者所注。

五、本书所收文献的题名、内容一般不作改动，早期文献有明显错漏字者不直接改动，用适当文字加“〔 〕”注明。

六、书末附有《中国古代出版大事记》和《中国古代出版史料有关论著要目》，供读者参阅。

七、本书从创意到主题、搜集、辑注的全过程均得到出版界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关注、指导，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和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有关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全力支持，使本书

得以问世，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2年6月

序 一

胡道静

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非常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我国在唐代初年即已发明雕版印刷术，可是没有文字记载。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汉城佛国寺发现塔顶所藏经卷，其中用有唐武则天所制造的文字，证明其为当时的印制物。后来雕版印刷在民间普为流传，刻印佛经、日历等，多有实物发现。再后到五代时，政府刻印《九经》，广颁民间。可是直至宋初编著《五代会要》才略有记载。唯一突出的记载，是活字版发明后，还不到四十年，便有沈括详细记述在他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正因为沈括是一位科学家，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而能作出及时的、详尽的记录。

更令人惊异的是，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而在出版界本身方面，却淡然置之，鲜有对此开天辟地的伟业加以记录。虽也偶然有些论文，分散发表，终未见有体系地、面面俱到地加以叙记。有鉴于必须弥补这个缺憾，我们出版界的宋原

放、吴道弘、方厚枢、陈江、汪家熔、王有朋等同志，接受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老出版工作者委员会的委托，负担起编纂巨型《中国出版史料》的重任。我在序首不嫌其烦地描述了我国出版界的缺陷，意在反映出如今这一巨大著述文集出现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是值得令人兴奋的大事。

新编《中国出版史料》共为十册，约四百万字。其上限自古代至近代，下限包括共和国成立后至世纪末。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多多，当然包括在内。本书在着手编纂之前，经过郑重周密的考虑，所以框架结构完善，收录有条有理，故名为《史料》，实际成为一部可阅读的信史。正因为这样，显出与已往张静庐先生所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有很大的不同来。从名称上看，张书即有时代上的局限性。其次，张书数编，次第编印，不适合于阅读求得全面认识的要求。新编《中国出版史料》并非为顶着张书的不足而来，但我觉得应有说明几句的必要。

还有，近时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出版史料》一书，主要是收集《出版工作》、《中国出版》、《中国出版年鉴》以及各类报纸上有关的论文，分列专题而成。它的编辑特点和本书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用处。我觉得也有在这里说明一下的需要。

中国出版事业将有更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将起更大的作用。鉴往知来，在此分界线上，有宋原放等老同志这一部“光彩著作”的照耀，光辉的前途就在我们的眼前。

2000年7月1日于上海海隅文库

序 二

王 益

我国出版界，对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对出版史进行研究，逐渐重视起来了。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宋原放等同志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皇皇十大册，包孕古今，是一部从古代到当代的大型出版史研究文集。它的出版，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对于为此操劳的各位同志，包括接受出版的出版社的同志们，我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出版史料是为出版史研究服务的，而出版史研究又是为出版工作服务的。

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为出版史研究创造条件，提供依据。出版史研究，必须以出版史料为依据，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不能代替出版史研究。

一般讲：“鉴往察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出版史料可以直接为出版工作服务。但出版史料真正要为出版工作服务，更好地为出版工作服务，必须经过咀嚼消化。出版史料好比是富有营养成分的食品，食品必须经过咀嚼消化，才能被人体吸收。史料的咀嚼消化就是研究。通过史料的研究，总结出规律或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对出版工作起指导作用。

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史研究，可以看作是两回事。是互相衔接的两回事，因此也可以看作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或一回事的上下工序。不可以没有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也不可以没有出版史研究。

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可以吸收广泛的同志参加。凡做过出版工作的同志，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提供一些出版史料，而出版史研究，却会给人以高不可攀的印象，因而参加的人较少。其实，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是出版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参加了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就是做了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重要的一点是勿忘目的。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目的，按着目的去做。有目的才有方向，无目的就没有方向。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史研究都应该围绕一个目的去做。这个目的，就是繁荣和提高当前的出版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我相信《中国出版史料》一书的出版，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0年7月26日

目 录

- 编辑说明 (1)
- 序一..... 胡道静 (1)
- 序二..... 王 益 (3)
- 简牍检署考..... 王国维 (1)
- 论蔡伦发明“蔡侯纸” 刘光裕 (9)
- 敦煌遗书与我国古代的图书翻译及抄写..... 白玉岱 (33)
- 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 白化文 (44)
- 《汉书·艺文志》序 (汉) 班 固 (65)
- 《隋书·经籍志》序 (唐) 魏 征 (67)
- 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 (元) 马端临 (73)
- 中国雕板源流考 孙毓修 (104)
- 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 胡道静 (146)
- 唐代刊书考 向 达 (149)
- 雕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 张秀民 (167)
- 《弘简录》不足为据
——雕板印刷起于唐初贞观说质疑 陈石铭 (173)
- 雕版印刷起源说略 曹 之 (186)
- 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 肖东发 (196)
-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 赵万里 (221)

五代两宋监本考	王国维 (230)
《两浙古刊本考》序	王国维 (300)
唐宋蜀刻本简述	顾廷龙 (302)
宋代刻书述略	李致忠 (310)
南宋的雕版印刷	宿白 (360)
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	
——限于四部目录书的著录	宿白 (402)
宋代版刻地图考录	黄燕生 (410)
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及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肖东发 (425)
西夏雕版印刷概况	徐庄 (456)
元代刻书述略	李致忠 (478)
明代版刻述略	周心慧 (513)
明代南监刻书考	曹之 (582)
毛晋汲古阁的出版事业	缪咏禾 (592)

简牍检署考^①

王国维

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者言之，则用竹木者曰册。《书·金縢》：“史乃册祝”；《珞诰》：“王命作册”，“逸祝册”；《顾命》：“命作册”。度册字或假鞭策之策字为之。《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既夕礼》：“书遣于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左传》：“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又“名藏在诸侯之策”是也。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左传》：“执简以往”；《王制》：“太史执简记”是也。用木书者曰方。《聘礼》：“不及百名书于方”；《既夕礼》：“书赠于方”；《周礼·内史》：“以方出之”；《哲簇氏》：“以方书十日之号”是也。曰版。《周礼·小宰》：“听闾里以版图”；《司书》：“掌邦人之版”；《大胥》：“掌学士之版”；《司士》：“掌群臣之版”；《司民》：“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是也。曰牒。《韩诗外传·七》：“周舍见赵简子，云墨笔操牒”是也。竹木通谓之牒，亦谓之札。司马贞《史记索隐》：“牒，小木札也”；颜师古《汉书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此谓木牒，木札也。《说文·六》：“简，牒也”，又《七》：“牒，札也”；《论衡·十二量知篇》：“截竹为简，破以为牒”；《文心雕龙·五》：“短简编牒”，此谓竹牒也。《左传疏》：“单执一札谓之简”，此谓竹札也。殷周制度虽不可得而详，然战国以降

则可略述焉。

简策之别旧说不一。郑康成《仪礼记注》，杜元凯《左传注》皆云：“策，简也。”贾公彦《仪礼疏》谓：“简据一片而言，策是连编之称。”孔颖达《左传疏》亦曰：“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是贾孔二君均以简为策中一札。然孔氏于《尚书疏》又引顾彪说曰：“二尺四寸为策，一尺二寸为简。”则又以长短别之，前说是也。

古策有长短，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而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论衡·十二量知篇》：“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十二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非儒者之责也。”按《说文·五》引庄都说：“典，大册也。”而五帝之书名典，则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其来远矣。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仪礼疏》引郑注《论语序》云：“《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又谦焉。”按：尺二寸当作二尺四寸。《左传疏》云：“郑元注《论语序》以《孝经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孝经》一尺二寸书。’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通典·五十四》：“封禅使许敬宗等奏，按《孝经钩命决》云，《六经》策长二尺四寸，《孝经》策长一尺二寸。”则贾《疏》之尺二寸为二尺四寸之讹无疑也。以上三说贾孔二君仅见康成《论语序》，未见《钩命决》原文，而所引郑《序》又皆仅撮其意，不尽举其辞细绎之。则郑之所以知《六经》策皆二尺四寸者，亦第据《钩命决》所云《春秋》策推之，并未亲见《六经》策。盖郑君生年后于王仲任，其时中原简策制度已有变易。《后汉书·周磐传》：磐遗令，“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以置棺

前。”盖其时旧制渐废，故磬特用之，史亦著之云尔。且不独古《六经》策为二尺四寸也。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纶。以臣勖前所考定之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则周时国史记注策亦二尺四寸也。礼制法令之书亦然。《后汉书·曹褒传》：褒“撰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则礼书之制也。《盐铁论·下·贵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则律书之制也。此上所云尺寸，皆汉尺，非周尺。周尺二种，一以十寸为尺，一以八寸为尺。其以八寸为尺者，汉之二尺四寸正当周之三尺。故《盐铁论》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记·酷吏传》称“三尺法”，《汉书·朱博传》言“三尺律令”，盖犹沿用周时语也。

……

若一简行数，则或两行，或一行；字数则视简之长短以为差，自四十字至八字不等。《晋书·束皙传》：“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穆天子传》简长二尺四寸，而一简四十字，恐亦两行。然以一行为常。《左传疏》云：“简之所容一行字耳。”《尚书》本二尺四寸策，《聘礼疏》引郑《注》云：“《尚书》三十字一简。”《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以二尺四寸策而每简二三十个字，则一行可知。《左传》之策，当短于《孝经》，或用八寸策。《聘礼疏》引服虔《注》左氏曰：“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当亦每简一行也。”

……

至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殊不可考。《考工记》：“筑

氏为削”。郑《注》：“今之书刀”。贾《疏》：“古者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按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虽殷周之书，并非尽用刀刻。《大戴礼·践阼》篇：“师尚父谓，黄帝颞顛之道在丹书”，《周礼·司约·小约》：“剂书于丹图”，《左传》：“斐豹，隶也，著于丹书”，郑注《周礼》云：“丹书未详”，杜注《左传》云：“以丹书其‘非’”。按《越绝书·十三》云：“越王以丹书帛致诸枕中，以为国宝”，则杜说殆是也。至周之季年则有墨书。《管子·霸形》篇：“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韩诗外传·七》：“周舍见赵简子曰：臣愿为谀谀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伺君之过而书之。”此是为周时已有墨书之据。且汲冢所出《穆天子传》必书于魏安厘王以前，而为墨书（见上），则战国以后无有用刀刻者矣。

策之编法，用韦或用丝。《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此用韦者也。《穆天子传》以素丝纶，《考工记》以青丝纶，《孙子》以缥丝纶（见《御览》引刘向《别录》），此用丝者也。至编次之状，则《说文》所谓“中有二编”，《独断》所谓“两编”者是。观篆文爌字之形可悟矣。

……

周时方版尺寸盖不可得而详。若秦汉以降之牍，则其制度可略言焉。牍之未成者为槩。《说文·七》：“槩，牍朴也”；《论衡·量知篇》：“断木为槩，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槩之本义也。牍之未制者必长于常牍，故牍之长者亦称为槩。《西京杂记·三》由：“扬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槩，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释名·六》：“槩，板之长三尺者也。槩，渐也，言其渐渐然长也。”颜师古《急就篇注·三》亦云，此后起之义也。牍之最长者为槩，其次为檄，长二尺。《说文·六》“檄，

二尺书”……其次为传信，长一尺五寸。《汉书·孝平纪》：“一封貂传”，《注》：“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是也。其次为牍，长一尺。《汉书·游侠传》：“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弃之以为荣”；《说文·七》：“牍，书板也”；《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蔡邕传》，《注》皆云：“《说文》曰：牍，书版也，长一尺”，盖通行之制也。惟天子诏书独用尺一牍。《史记·匈奴传》：“汉遣单于书牍以尺一寸。”《汉旧仪》之尺一板（《续汉志注》、《大唐六典》、《通典》诸书引）、《汉仪》之尺一诏（《御览》五百九十三引）、《独断》之尺一木，皆是也。汉人又单谓之尺一。《后汉书·杨赐传》云：“断绝尺一”，《李云传》云：“尺一拜用”，《儒林传》云：“尺一出升”，《续汉书·五行志》云：“尺一雨布”，皆是。《魏志·夏侯玄传》：“先是有诈，作尺一诏书，以玄为大将军”，则魏制犹然。汉时以长牍为尊，故臣下用一尺，天子用尺一。至中行说教单于，用尺二寸牍，乃用以夸汉，非定制。制惟封禅玉牒，其制仿牍为之，而长尺三寸，此又非常大典，不能以定制论也。魏晋以后浸以加侈，有至一尺二寸者……若汉时之牍，则仅有一尺，尺一两种，此外别无所闻。又其次则为五寸，门关之传是也。《汉书·孝文帝纪》：“除关无用传。”按：传信有两种：一为乘驿者之传，上所云尺五寸者是也，一为出入关门之传。郑氏《周礼注》所谓“若今过所文书”是也。其制则崔豹《古今注》云：“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此最短之牍也。……由是观之，则秦汉简牍之长短皆有比例存乎其间。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牍则自三尺（檠），而二尺（檄），而尺五寸（传信），而一尺（牍），而五寸（门关之传）。一均为二十四之分数，一均为五之倍数，此皆信而可征者也。

……

周时方版尺寸虽不可考，然《聘礼》云：“不及百名书于方”，则一方固可容八九十字。《既夕礼》：“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赠于方，若九、若七、若五。”郑《注》：“方，版也。书赠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夫一方之字数可至八九十，而行数可至于九，则其制不得过狭。所谓方者，或即以其形制名欤？至汉时之牍则分广狭二种：广者为牍，狭者为奏。《释名·六》：“奏，邹也；邹，狭小之言也”，《论衡·十三效力》篇：“书五行之牍、十奏之记，其才劣者，笔墨之力犹难。”按：记之为言书也，十奏之记犹言十牍之书也。《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盖奏事之书以狭牍连编之，故得奏之名。《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云：“既常蓄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则版与奏明为二物。《释名·六》：“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以刺但需写爵姓里名，故用牍之狭者也。至诸牍广狭之制，则常牍之广，大抵三分其表而有其一。《续汉书·祭祀志》：“玉牒书长尺三寸，广五寸”，《通典》：“晋六礼版长尺二寸，广四寸”，其式可以此推。牍上之字以五行为率。《论衡》云：“五行之牍”；《独断》云：“表文多，以编两行，少，以五行”，盖文多者编两行牍若干书之，而少者以五行牍，一与周之“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同意。广四五寸者，容五行之字，于形制亦宜，若以小字细书之，则得书十行。《后汉书·循吏传》：“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穡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其以手迹赐方国者，曾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俭约之风，行于上下。”此于五行之牍书十行之字，乃光武示民以俭之意，初非常制如斯也。至狭牍之书，则容两行。《独断》云：“表文多，以编两行”，又云：“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隶书尺一木两